

地方政府别再陷入增长迷雾之中

章玉贵

有关中国农业银行日前向上海市政府提供2500亿元信用贷款的消息,在当下极为敏感的时间窗口,尤为引人注目。尽管有消息称该笔贷款主要用于迪斯尼乐园项目以及被列为国家战略的上海自贸区相关项目,因而不乏商业角度考虑,但若此消息最终被证实,则如此大笔贷款行为背后的政府色彩无法抹去。

另一方面,一向有着“第二财政”之称的国开行,近日先后与江苏、河北、青海等省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以加大对上述省份的支持力度。这被视为定向配置到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带有财政刺激的痕迹。至于重庆等地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密集批复,无疑又是一个政府投资饥渴症的爆发。

在完成年度指标时间不足5个月的情况下,找到既符合政策又能有效拉抬

地方GDP的路径,让各地政府殚精竭虑。于是,无论是打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旗号而出台的基建规划,还是前一阶段地方首长频频拜会财政部长、抑或省长卖煤,乃至上海这样发达地区也要国家给予政策与资金支持,都是增长焦虑症的真实写照。

在全社会似乎已开始接受经济增速低于8%这个所谓的“增长底线”,京沪等指标性城市率先将追求经济增长质量放在施政第一位,广东也不再刻意做大GDP蛋糕之际,我们不要对理念的转变盲目乐观。当今年前两个季度经济指标不大好时,早已植根于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官员脑海中的“保增长”理念再度被激活。而这根敏感神经近来之所以如此活跃,正如“2013·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所揭示的,“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及与此相关的“与GDP挂钩的绩效考核制度不科学”是妨碍中

国经济转型的最主要阻力。

在稳增长和经济转型这两大战略选项之间,各级政府切勿为了短期经济指标的一时好看而一再延误转型时机。眼下,当务之急是要以理性的态度面对上述问题与困难。中央要求经济工作远近结合,在有效应对好短期问题、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力气更多地放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上来,放到扩大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上来。

从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观察,增长与转型孰是第一要务已经非常明确。错误转型时机只会增加边际成本。如今,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以及经济内外失衡持续加剧是不争的事实。偏好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中国经济已经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因此,当决策层不再对短期经济增长势头下滑格外担心,正在启动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深层次改革时,亟需强化地方的执行力,消除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

在经济规模跃上8万亿美元台阶之后,中国应该做好适应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不要指望未来20年、30年中国经济还能取得前30年的类似增速。即便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高速增长的目标,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

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环节。

从历史上看,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就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商业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要使“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在各地得到落实,就必须以政绩考核机制改革为突破口,拨开多年来笼罩在地方政府头上的增长迷雾,告别低效的大手笔投资刺激思维,将经济增长切换到内生性技术进步和有效内需拉动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一方面,要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解决民营资本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品质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上市公司不能充当冤大头

皮海洲

虽然在某公司最近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该公司剥离资产的议案以76.81%的同意票获得通过,但约四分之一的反对票表明,股东对公司剥离该项资产不满意的人不少。而舆论也质疑以6100万元低价甩卖过亿资产,有向接盘方即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的嫌疑。

笔者无意介入到这一交易个案的争论当中。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发展的需要,公司剥离某部分资产出去,或收购某部分资产进来,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交易价格有折价、有溢价,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让投资者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上市公司卖出的资产常常大幅折价,而买进的资产却是大幅溢价?为什么这冤大头总是让上市公司当了?

有一种解释是,上市公司剥离出来的是亏损的资产,或者劣质资产;而买进的资产则是优质资产,可以给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这种解释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上市公司折价卖出、溢价买进资产的原因。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单纯。

从上市公司剥离出来的资产未必真的就是劣质资产,虽然有的公司剥离出来的资产账面上是亏损,但实际上是人为做出来的。最明显的是曾经在A股市场上掀起波澜的立立电子公司,该公司甚至已经在中小板成功发行股票只等挂牌上市了,但就在即将上市的前一天,该公司的上市事宜被叫停,因为该公司的上市资产遭到媒体方面的质疑,是从另一公司腾挪过来的,涉嫌同一资产二次上市。如果说这个案例有些特殊的话,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的案例。比如,同一块资产,若干年前被上市公司廉价剥离出来了,但几年后又被上市公司从大股东

手上高价收购回去,这样的事情也常有发生。所以,从上市公司剥离出来的资产,很难说就是劣质资产,资产亏损有可能是假象。

同样的上市公司买进的资产未必就是优质资产,这其中甚至不乏高价收购的劣质资产。比较常见的是,收购进来的资产远远达不到预期的收益。更有甚者,上市公司收购进来的资产本身就是劣质资产或亏损资产。比如最近一家餐饮类公司为摆脱业务下滑的困境拟涉足环保业,但其收购的资产三年营收为零,并且在收购的资产中,其中的一块资产难觅踪迹。另外,还有一家上市公司以17.75倍的溢价收购另一家经营亏损的公司。可见,这些交易中上市公司充当冤大头角色的可能性很大。

上市公司充当冤大头归根到底在于,最终的埋单者是广大的公众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比如高溢价收购亏损资产,只因为上市公司的钱来得容易,都是从投资者的荷包里掏出来的,上市公司花起来并不心痛。又如贱卖资产,真正利益受损的还是公众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至于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他们反而可以从刻意安排的溢价和折价交易中受益,这是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一种手段。

中小投资者面对上市公司充当冤大头,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由于一股独大的原因,中小投资者的话语权非常有限。并且在投机炒作盛行的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收购行为往往都被视为利好而受到市场的炒作,投资者乐于追逐市场短炒带来的差价,哪里还顾得上反对资产收购价格的不合理呢?至于未来收购资产达不到预期收益,那就是届时谁持有股票谁倒霉了。

企业景气分化 微观放活需尽快落实

宣宇

7月份经济数据释放出“稳增长”效果持续显现的积极信号。工业生产增幅扭转了持续2个月回落态势,投资也呈企稳迹象,随着政策落实和欧美市场明显好转,7月外贸也大幅改善,进出口增速双双由负转正。

政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通过加强水利、城市等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有效稳住经济增长,一方面又能有助化解过剩产能。从6月起政府已启动了水利等中央项目,有针对性加强了基础设施及薄弱环节建设,随着中央投资加快,稳增长效果持续显现。定向“稳增长”措施由于主要属于常规性投资项目,缓解了传统行业产能压力。7月工业产品销售率大幅回升至98.4%,工业销售情况显著改善。7月制造业增长10.5%,比6月大幅提高0.9个百分点,多数行业同比增幅扩大,其中黑色金属冶炼、汽车制造、电气机

械以及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幅均比6月超出2个百分点。钢材、有色金属、发电量、汽车和水泥产量增幅均持续扩大。

在多项数据传递向好信息的同时,也折射出经济隐忧。“稳增长”措施在吸收过剩产能的同时,也导致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在大型企业 and 中小企业之间明显分化。7月汇丰PMI回升0.4个百分点至50.8%,呈加速扩张态势,而中小企业景气度处于持续收缩状态,尤其中型企业景气度还有所下降。这表明大企业率先从“稳增长”中获益,但广大中小企业景气度仍处收缩通道,经济内在动能并未真正复苏。

7月官方制造业PMI与汇丰PMI明显背离,也说明了中小企业(尤其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7月汇丰PMI终值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至47.7%,其产出指数、新订单和就业指数均不同程度回落,尤其新订单指数更创下11

个月来最大降幅。此外,1-7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3.3%,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民间投资自去年10月份开始持续回落,反映出民营资本对经济的谨慎态度。

此前,由于房地产调控、淘汰落后产能实质性推进以及上半年经济下行惯性导致三季度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最新公布的7月份数据所透露的实体经济转暖,缓解了市场担心情绪,但当前中小企业景气度仍未实质性改善,经济内生动力仍偏弱,需要高度关注。广大中小企业不仅是经济内生动力的重要载体,而且也是吸收就业的主要领域。上半年就业总体形势良好,为“调结构、促改革”创造了条件,也为经济下行容忍度不断提升提供了根本保障,扩展了“稳增长”的底部空间。

7月底政治局会议指出,下半年要“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等的政策扶持和服务力度,进一步清费减负,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焦点评论

地方政府再度吹响投资号角



地方押注稳增长,投资号角又吹响。继续修建铁公基,大力改造棚户区。有保有压上项目,或急或缓做文章。无效折腾要避免,尊重民意与市场。

ICLONG/漫画
孙勇/诗

“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把钱用在刀刃上”。从目前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微观放活效果还远远不够。政府需要加快落实各项微观放活措施,加快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尽快落实减免税负政策,尤其要切实增加中小微企业信贷覆盖度和可得性,真正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内生动力。

在当前“稳增长”措施效果持续显现的有利时机,在不出台大规模刺激性政策的前提下,只有加快微观放活措施的落实,有效接续增长后劲,才能真正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者的有机统一和动态平衡。只有广大中小企业活力增强了,就业总体良好的局面才能延续,才能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主要为结构性困难)增加主渠道,从而为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创造出好的基本环境,政府才能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组合中,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后两者,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才能稳步推进。

(作者系财达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

■ 算法经济 | Li Bin's Column |

“占补平衡”愚不可及 土地流转方能治本



李斌

上期讲到,粮食要安全,就要抓紧介入和培育世界粮食市场。这一主张的另一个理由在于,国内土地的“占补平衡”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即便出于暂时的需要,我们也必须出国“借粮”。

制订18亿亩土地红线的根据之一,就是进行了土地的占用与补充可以相互抵消的道理: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他进了城,乡下的房子与土地就会空出来,于是通过“占补平衡”政策,促使地方政府抓紧进行土地整理与复垦。这可真是个美妙的想法!笔者猜想,想出这个主意的人,一定是很得意的,他一定以为自己正在搞“科学管理”——事实上,土地管理部门的反复声明,土地红线是经过“科学测算”而得出的结果。

可是,有关部门忽视了,在土地的占用与补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时差,城市就必须立即提供(或大或小的)住房,可是,他在乡下的房屋一般都是继续保留的,老人、妇女、儿童都还住在那里,等待着一年的团圆。举家进城所需的资金,需要长期的积累;生活方式与观念的改变,都需要经历很多个年头。也就是说,在城市扩大占用耕地的同时,乡村并不能同步地缩小。

这种不同步的效应,还因僵硬的农村政策而得到极度的强化,这个政策就是,农村的土地和房屋禁止流转与买卖。因为壮劳力进了城而不愿意再耕种土地的人,要么临时请人帮忙代种,要么则须将土地无偿交还集体。至于房屋,既然不允许买卖,无论住与不住,当然不允许长期保留了,断无无偿赠与他人道理。也就是说,政策实际上在强烈地抑制农村宅基地还原本为耕地。在划出土地红线之前的几十年中,我国的耕地面积只是单方面地缩小,无从补充,同期农村宅基地面积不仅未能缩小,反而在急剧地扩张。原因就在于此。由于没有市场价值,宅基地也就无人节约,不申请白不申请,不占白不占,于是农民一边在城市打工,一边在家乡申请新的宅院。

房价一涨,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就都暴露出来了,“占补平衡”的道理也终于意识到了,那么,好吧,抓紧开放土地流转和农村房屋交易、把土地补充搞起来吧?问题是,划红线的人只管划红线,别的一概不管。在“占补平衡”口号之下,其他政策照旧。也就是说,在“占”的同时,国家并未同时给出土地补充的正常渠道。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莫非广大农村干部是孙悟空,能够吹一口气就把城市占用的土地补回来不成?

为了多占地,地方政府必须挖空心思,采用各种非常规的、歪门邪道的方法来补充土地。他们不得不向森林、草地、滩涂、山间、河道和墓地进军,以便凑足必要的数字。土地违法现象必然就会大量发生。更为糟糕的是,农村的自然环境又被破坏了,那些被复垦的植被,也许就是许多年前通过退耕还林而培育起来的。

读到这里,想必读者们已经明白,这是多么“有趣”的政策啊!本人认为,制订出这一系列貌似聪明、实则无比愚蠢的

荒唐政策的人有滥用职权和渎职之嫌。不知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这个观点还可由以下证据来支持:现行体制实际上不允许城市人口自由地迁徙到农村(正在制定的城市化方案似乎仍然没有考虑这个因素)。不要以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只存在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自然的经济秩序必然存在反向的人流,只是后一种人流的规模一般不如前一种那么大。反向的人流首先到达城市的郊区,并把那里迅速建设为新的市镇。他还将深入广大农村的腹地,改变那里的生活方式与社会面貌。这个人流为新进入大城市的人口腾出了居住与活动的空间。所以,如同农村一样,城市本身的空间也存在流转的问题,而这一切都被现行体制所阻止了。城市的人口只能被拘束在体系之内。

有人可能会问:纯粹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怎样呢?在那里总可以实现“占补平衡”吧?我们就来看一下。

一项专门的研究(张军岩、贾绍凤:《基于中日比较的人口城市化对耕地影响机制研究》,载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1期)描述了日本在过去120年间土地占用与补充的情况。数据显示,通过120年的循环,日本基本实现了“占补平衡”,但是,在各个分阶段上,占与补都是不平衡的,要么占的多,要么补的多。其实,这个道理只要用常理来想一想,就是很自然的。这项研究尤其强调了,城市化的总后果其实是节约土地的,日本的耕地规模之所以从1960年起不断下降,一路跌到120年前的水平(粮食自给率同时也跌到如今的40%左右),并不是因为耕地减少了,被占用了,而是放弃耕作所致——工商业赚取的收入实在太高,相比之下,外国粮食实在便宜,以致没有必要去耕种国内那些比较贫瘠的土地,还不如使之休养生息。

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可能的未来。当然,由于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约为日本的两倍,因此,即使放开对粮食自给率的管理,也不可能跌到日本的40%。只要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自己的饭碗”则这个结果是一定会有的,即使想刻意避免也不是那么容易避免的。城市化过程完成以后,大部分国民将聚集在各个城镇之中居住,乡下的土地有的是,千万别担心。

目前土地紧张的气氛完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在以上的错误政策之下,土地怎么可能不紧张呢?当务之急显然就是开展全国土地与房屋的自由流转与交易,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乡下的房子可以出售了,农民就会爽快地卖出,再拿钱进城买楼。居住在农村的人,就会尽量地结伴而居,自愿让出多余的房屋和土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整理与复垦才是可行的,占与补的矛盾才会得到缓解。这个道理无比地简单和朴实,无论请世界银行,还是“宇宙银行”来诊断,都不会有第二种意见。

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指望占与补可以立即完全地实现平衡。不管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迂回到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都将是难以避免的。短期说来,国外的粮食相当于一种暂时的垫支,它可以为国内土地的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一旦国内土地复垦较多,对外采购量也就会下降。但是,人均粮食消费是增长的,这个因素将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以及种植技术的进步,将会长期地影响国内粮食产量。加之人口数量未来将会先增后减,变化多端,粮食自给率必然将会长期地处于动荡之中,国内粮食市场因此需要与国际市场进行无缝对接,以便灵活、及时而精确地调剂余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所谓的“红线”、“指标”、“平衡”都将只是有害无益的空想。